

谈谈我毕业后的经历

○丁宁宁（1977级电机）



丁宁宁学长

1982年7月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，这纯粹是个机遇。80年代初，我国对外开放步伐日益加快，出于外资项目审批程序国际化的需要，国务院领导要求尽快制订一份《国家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》，以取代前苏联模式的《计划任务书》。这一工作需要英文和高等数学知识，但当时国内大学经济系刚刚恢复高等数学和英语教学，还没有毕业生，于是决定从清华选人。

来中心以后，在马洪同志的领导下，我参加了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，以及一系列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课题研究和项目论证，其中包括山西能源基地规划、宝钢二期、核电规划、平朔露天煤矿、长江三峡水电枢纽项目、南海石油等。同时根据马洪同志的安排，承担了特区货币、新技术革命与挑战、信贷扩张与货币投放、国际石油价格、2000年的中国、六五总

结等研究报告的起草任务等。

这些工作使我受到了很大锻炼，同时也感到了学习经济理论的必要性。1985年下半年，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妹妹告诉我，报考著名经济学家王珏教授博士研究生的人数不多，可以试一试。经马洪等三位资深经济学家的推荐，我以同等学力资格参加了考试，成为中央党校首届博士研究生。在党校学习期间，我没有脱离中心工作，还参与了国家体改委组织的“体改中期规划”工作，是中央党校方案的主要执笔人。

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，我坚守工作岗位，发挥了稳定机关的作用；并利用中心的工作条件，两次直接向戒严指挥部提出建议。一是建议戒严部队不要露营，以减少不必要的误伤，二是建议隔离民众伤员和部队伤员，以减少不必要的二次伤害。不过事后我没有违心地附和领导上“动用军队不可避免”的意见，也没有拒绝完成领导上交办的各种文件起草任务，并挤出时间来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。

1990年6月获得中央党校首届经济学博士学位后，我继续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。参加了薛暮桥同志主持的“机制转换与体制创新——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战略选择”，以及吴敬琏同志主持的“七五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总结”课题研究，并提出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应当是“正确处理改革、发展和稳定的关系”。为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的政策

□ 我与清华

转变打了一个前哨战。

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后不久，中央党校科研部和《求是》杂志内参组织了一次内部讨论会，我在会上赞扬了小平同志讲话的大方向，并提了几点不同意见，比如对经济过热的担忧，但却因此而因祸得福，在单位领导孙尚清同志的安排下，取得了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进修的机会。

我在牛津大学选择的学习题目是英国经济史，更重要的是对英国社会有了直观的了解。利用周末、节假日时间，我参加了各种社区、教会的活动，访问了5个英国家庭，参观了牛津、伦敦的主要博物馆。在伦敦 Price Waterhouse 实习期间，除进

修会计课程外，还旁听了议会、法院的辩论。一年期的出国进修明显提高了我的英语口语水平，对我后来的政策研究与对外交流工作有很大帮助。

回国以后，朱镕基总理已经开始宏观调控，也就没有人翻我的旧账了。中心领导任命我为企业经济研究部的负责人，参与了十四届三中全会、十五大有关国有企业改革文件的起草、修改工作。经中心领导推荐，我同时兼任了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股份公司上市审查委员（1993—2000）。1998年底，根据中心领导安排，我调任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（1998—2008），2009年8月正式退休。

跑，在清华

○ 郜峰麟（1986级计算机）

离开清华已经20多年了，可我这时的心情可以用兴奋来形容，那是一种用兴奋还不足以形容的感觉，我想叫，大声叫，把心中的喜悦喊出来！

夜幕下的西大操场，秋天的第一场雨后，操场东侧路灯投射出点点银光，透过梧桐树叶斑驳地洒在还湿润着的塑胶跑道上，西北角灯光明亮处伫立着一排健身架，南边也有一排，掩映在浓密的树荫下。

清华一直鼓励体育锻炼，马约翰先生尤甚。我上本科时的每天下午四点半，遍布学生宿舍区的高音喇叭里就会传出高亢悦耳的声音：“同学们，走出教室，走出

宿舍，去参加体育锻炼，保持强健的体魄，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！”提出“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这个口号的人的身体想必是极强健的，因此也希望他的校友们为了祖国保持健康。

我自1986年秋走进清华，一晃28年了。刚进校时，什么都是新的，也坚持了几天从九号楼宿舍到清华南门的晨跑。那个时候，天是蓝的，空气是清新的。可惜坚持了没几天，后来的锻炼就基本只集中在体育课和隔三差五下午的锻炼上了，再也没有去晨跑过，而且锻炼的科目大多数聚焦在篮球、排球和游泳上。清华的体育课丰富多彩，除了大一是身体素质为主的训练之外，好像大二就开始选课了，种类繁多，足篮排自不必说，武术散打也有，乒乓球等是热门课程，女生也有艺术体操，到现在还开设有射击课，真是幸福。

我大一时的体育老师叫刘儒义，一个